

否认本身为“夷”，或模糊“华夷”界限，或以民族、方位称呼王朝，都是在否定过去“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探索新的华夷观和正统观，开始把本民族及其他非主体民族纳入“中华”的范畴之内，使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在内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向着华夷一体、增强中国意识，向着多民族中国认同的方向前进。这是自南北朝时期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魏王朝大力学习中华文化以后，几个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又一次更强烈地吹起华风，争芳斗艳，交相辉映，彰显浓重的中华意识，加强了民族间的大融合，为此后的元世祖忽必烈以中华正统皇帝的身份发布即位诏书这样完全认同中国的重大举措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打下了高度认同中国的厚重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论述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时，还特别提到：“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¹，高度概括了中国两个王朝分立、对峙的时代各王朝对中国的认同。

【网络文章】

维吾尔族认同从何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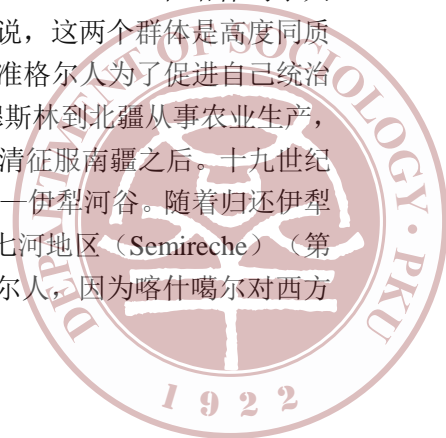
微信公众号：开花屯的声音（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

<https://www.douban.com/note/714013918/>（2020-12-9）

维吾尔——这一沉寂了数百年的名词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初复活进而成为新疆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的族名？这是吸引了众多新疆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但要解决它却并非易事，需要研究者起码能阅读汉文、察合台文、现代维吾尔文以及俄文文献。能同时精通以上语言文字的学者屈指可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博大卫（David Brophy）博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 2016 年出版的新书《维吾尔族：俄中边境上的改革和革命》（*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便成功利用语言上的天赋来解决了解决了该问题。博大卫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他并非专注于新疆本土的定居型穆斯林，而是选择从移居俄国中亚的穆斯林入手，通过探索身处两大帝国之间的这些群体如何应对历史变迁来展示现代维吾尔族认同的诞生过程。

为了搞清楚维吾尔族认同从何而来，博大卫先从研究塔兰奇人（Taranchi）和喀什噶尔人（Kashgari）这两个穆斯林族群在俄国中亚的形成入手。从族源上来说，这两个群体是高度同质化的，均属南疆的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不过，在准格尔汗国时期，准格尔人为了促进自己统治核心地带——阿尔泰和伊犁的农业发展，迁徙了部分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到北疆从事农业生产，迁徙到北疆的穆斯林被称为塔兰奇人（农民），该政策甚至延续到大清征服南疆之后。十九世纪中晚期，沙俄趁着新疆发生叛乱的机会占领了塔兰奇人主要聚居地——伊犁河谷。随着归还伊犁的 1881 年中俄条约签订，大约有一万户塔兰奇人移居到俄国中亚的七河地区（Semireche）（第 68 页）。在南疆，那里的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被西方人称为喀什噶尔人，因为喀什噶尔对西方

¹ 《人民日报》2019 年 09 月 28 日。



来说是塔里木盆地知名度最高的城市。从十七世纪开始，一些喀什噶尔人陆续迁居到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Ferghana Valley），大清对南疆的征服则加剧了追随和卓家族的喀什噶尔人跑到费尔干纳。进入十九世纪中晚期，更多的南疆商人和季节劳工进入俄国中亚，在那里形成规模不小的喀什噶尔人社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政治和伊斯兰改革运动对身处清俄两大帝国之间的突厥语穆斯林现代性观念的形塑有着巨大影响。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早在清代即对奥斯曼帝国抱有较强的亲近感，这在一定程度促使部分人积极前往伊斯坦布尔经商和学习。发端自沙俄克里米亚和伏尔加鞑靼人的贾迪德运动（Jadidism）也在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传播。由于贾迪德运动倡导新式教育，试图通过教育改良伊斯兰，也受到在伊斯坦布尔的新疆突厥语穆斯林欢迎，他们将贾迪德运动带到了新疆，并结合清末新政，改良新疆传统的学校。新疆本地的大商人比如穆萨巴约夫家族（Musabayev）对此表示强烈支持，他们创建或资助现代化学校，从国外招募教师，甚至派本地学生前往沙俄、奥斯曼学习。在精英阶层的推动下，到二十世纪初，无论是北疆的伊犁还是南疆的喀什噶尔都分布了倡导贾迪德运动的新式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的观念在悄然发生，对现代性不再陌生。

在辛亥革命前后，俄国穆斯林对新疆非常感兴趣，常来这里旅行并做记录和思考。其中一位塔兰奇诗人阿卜杜塞麦托夫（Abdusamadov）完成 1914 年新疆之旅后，哀叹那些突厥语穆斯林缺乏统一的民族认同，开始使用维吾尔之子（Uyghur Balisi）作为笔名。从此，维吾尔一词开始在塔兰奇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之所以维吾尔这个词在那时会受到知识分子重视，博大卫认为是受到突厥学（Turkology）发展的影响。突厥学的兴起让人们特别是突厥语穆斯林重新发现他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由回鹘/回纥人（Uyghur）创造的。逐渐的，沙俄和奥斯曼的突厥语穆斯林开始将维吾尔（Uyghur）视作文明的象征。在当时人的眼里，维吾尔（Uyghur）并不专指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而是任何一个实现较高文明水平的突厥语民族都称为维吾尔（第 142 页）。维吾尔的重新流行刚好也赶上沙俄爆发十月革命，那场革命改变了俄国中心地带的同时，也很快改变了俄国中亚的政治面貌。许多塔兰奇人和喀什噶尔人开始组织起来，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涌现了一批知识分子革命家，包括塔兰奇人阿卜杜拉·肉孜巴基夫（Abdullah Rozibaqiev）和喀什噶尔人卡德尔·哈吉（Qadir Haji），甚至出现了用维吾尔冠名的革命组织，如塔兰奇人的维吾尔俱乐部（Uyghur Club）。

1921 年塔什干会议及随之而来的新疆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分裂对现代维吾尔认同的产生至关重要。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俄国中亚，新疆穆斯林移民的各类革命团体 1921 年在塔什干召开大会，商讨革命形势和对策，代表主要由塔兰奇人的维吾尔俱乐部和喀什噶尔人的喀什噶尔-准格尔劳工联盟（Union of Kashgari and Jungharian Workers）派出。与之前的研究不同，博大卫并不认为苏联当局在此次大会为新疆突厥语穆斯林提出了统一族称，只是塔兰奇革命家肉孜巴基夫倡导来自南北疆的穆斯林移民要合作，提议双方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维吾尔六城和准格尔劳工革命联盟（the Revolutionary Union of Altishahri and Jungharian Workers——Uyghur），突显出维吾尔一词在塔兰奇革命者中有较高的正面知名度。塔兰奇人所认为的维吾尔，事实上也不止塔兰奇人和喀什噶尔人，还包括东干人（回族）。俄国中亚的新疆穆斯林移民认为，这三个群体尽管语言文字有所区别，但都是维吾尔的后代。只是肉孜巴基夫的合作倡议并未获得喀什噶尔人的真心支持，为了争夺突厥斯坦共产党维吾尔分部地方局（the Regional Bureau of Uyghur Sections）的领导权，两个群体最终分裂了，卡德尔·哈吉甚至无意用维吾尔来称呼喀什噶尔人。不过苏联当时的民族识别政策帮了个大忙，该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是并轨的，要实现自治，就要被当局识别为民族，可喀什噶尔人是根据原居地提出的群体名称，并不被苏联民族学家所接受，于是卡德

尔·哈吉就转向了维吾尔一词。如此一来，无论是塔兰奇人还是喀什噶尔人都开始接受“维吾尔”。

苏联维吾尔共产党员推动的民族文化建设以及新疆盛世才当局仿效苏联实施民族识别的政策促成了维吾尔民族认同构建的完成。尽管塔兰奇和喀什噶尔知识分子在建构统一民族方面无形中达成了默契，不过这两个族群事实上还存在不少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文字方面。从1920年代末开始，维吾尔共产党员们开始借助苏联正在提倡的民族文字拉丁化政策以及自我倡导的正字运动逐步实现了文字方面的统一。这样一来，苏联境内的维吾尔民族建构算是基本完成。然而在新疆，维吾尔民族的观念直到1930年代初还没有被广泛接受，那些参与1933年叛乱的突厥语穆斯林精英并没有将该词当做是统一的族称（第245页），这种局面直到盛世才上台才改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盛在内政外交上全面倒向苏联。在民族政策领域，他也仿效苏联搞民族识别，识别了包括维吾尔族、塔兰奇族在内的十四个民族。新疆和平起义后，中共大体沿袭了盛世才的民族识别政策，只是将塔兰奇族并入维吾尔族，这样就形成了新疆目前的民族构成。

本书最让人震撼的是多语种档案和文献的精熟运用，总共参考了位于阿拉木图、塔什干、莫斯科、圣彼得堡、台北、伦敦计十一个档案馆的一手资料，使用了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土耳其文、俄文、汉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多语种文献，这在以往的现代新疆研究中从未有过，而多语种档案和文献的使用对于追溯现代维吾尔族认同的起源极为重要。乌兹别克史专家爱德华·欧沃斯（Edward Allworth）1990年提出：苏联当局1921年主导塔什干会议采用“维吾尔”作为族名来指称俄国中亚及中国新疆的塔兰奇人与其他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Allworth, 1990）这一观点之后被海外的新疆研究者普遍采纳（Benson, 1990; Gladney, 1990; Rudelson, 1997）。对于不懂俄文的研究者来说，很难去验证欧沃斯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博大卫正好有这个条件。首先，他并不认为苏联当局主导了1921年塔什干会议，因为当时苏联中央掌控边缘地带的的能力其实很有限，反而是塔兰奇和喀什噶尔革命团体在唱主角。其次，“维吾尔”也没有在那次大会上被确定为新疆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的族名，“维吾尔”成为族名要等到大会之后的数年，而且也是喀什噶尔和塔兰奇革命者相互博弈以及应对外部局势变化的结果，很难说是计划好的事情。总之，通过梳理详实的一手档案，博大卫还原了1921年塔什干会议的来龙去脉，廓清了长期围绕在新疆研究界上头的疑云。

除了解释现代维吾尔族认同的起源，博大卫在书中还有不少有趣见解。比如他认为清廷是知道新疆的很多突厥语穆斯林把奥斯曼苏丹奉为哈里发，也知道很多人在周五礼拜的时候为他祷告，但清廷并不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威胁。与之相比，清廷倒是把突厥语穆斯林对苏菲派长老的盲目跟从视为隐患，而这些长老跟苏丹是没有关系的。他的这一观点似乎符合常识性推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处于衰落之中，时不时还跟沙俄发生大规模战争，想要染指万里之外的新疆是不太可能的。博大卫进一步指出，其实整个穆斯林世界对大清颇有亲近感，因为大家都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犯，所以前者对后者有同命相怜的情感。至于那些去伊斯坦布尔经商和学习的新疆籍穆斯林，他们虽对奥斯曼帝国抱有好感，但身处异乡，却是以大清臣民甚是代表自居，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对中国的认同（第87-91页）。以往，一些学者认为奥斯曼帝国对中国的新疆存在政治上的野心，而博大卫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它在近现代新疆历史所起的作用。又比如，博大卫在书中对阿克萨克尔（Aqsaqal，字面意思为“白胡子”）的详细检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治外法权在新疆的产生和发展。如果只注意到大清允许浩罕国在新疆设置阿克萨克尔来对过往的浩罕商人收税甚至干预司法，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这种制度的存在一直是单向的不平等实践。博大卫则通过史料的检视，发现整个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如此简单，首先设置阿克萨克尔在新疆是一种成例，清廷允许汉地商人以籍贯为标准在乌鲁木齐设置各类行会管理本省籍商人，对于新疆各地来乌鲁木齐的穆斯林商人则按照地域不同允许他们设置阿克萨克



尔来管理。最初允许浩罕任命阿克萨克尔是参照新疆地方的经验来做的，只是清廷没有想到，这种实践发展到后来会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意味，并被吞并浩罕的沙俄所承袭。其次辛亥革命后，为了继续保留阿克萨克尔制度，沙俄外交部提议中国可以在俄国突厥斯坦设立对等的阿克萨克尔管理在那里的中国属民（第 125-126 页），如此一来，就对原本不平等的单向实践进行了校正。

这本书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使用 Uyghur Nation 指称维吾尔族，Nation 一词往往给人以领土上的联想，暗示维吾尔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与新中国在民族识别时期给予维吾尔的民族定位是相悖的。在我国的政治语境下，维吾尔属于 Nationality[1]，它可以有领土属性，但这块领土被称为民族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而不是国家（State）。博大卫之所以采用 Nation 而非 Nationality 来指称维吾尔，可能是受到苏联民族政治话语的影响。苏联进行民族划分是按照斯大林 1913 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提出的四个标准来进行的，文中所要识别的民族就是 Nation (нация)，而非 Nationality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苏联和新中国的国情不同，列宁无意建立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单一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而是承认它是由多个民族国家构成的联盟（Soviet Union），因此允许境内存在多个 Nations。对那些参与民族构建的苏联籍塔兰奇和喀什噶尔革命者而言，他们也能看到维吾尔有成为 Nation 的可能。虽然博大卫基于苏联民族政治话语使用 Nation 有一定合理成分，但有必要在书中专门对此作一说明，毕竟维吾尔的主体是在新疆。

最后指出这本书存在的一个瑕疵，博大卫在第 271 页说“三先生”（Three Effendis）1949 年解放后都流亡到国外了，这与史实不符。“三先生”中的麦斯武德最后并没有出去，而是被收监然后于 1952 死于大陆。

参考文献：

Allworth, Edward. *The Modern Uzbeks: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1990.

Benson, Linda.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E. Sharpe, 1990.

Brophy, David.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Gladney, Dru.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 *Central Asian Survey*, 9 (1), 1990:1-28.

Rudelson, Justi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 目前维吾尔族的官方英文名称已改为 Uyghur ethnic group。

【网络文章】

新疆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

